金融业应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田国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市场”，除了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阶段，更应注重发挥国际市场的作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对于中国金融业来说，既是责任，也是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当其时、一举多得

经过长期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前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其中就包括部分行业和企业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解决这类问题尤其要发挥市场的作用，理应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开辟国际市场这片蓝海。

以经济促外交，担当国际责任，提升全球地位。通过企业“走出去”推动经济合作，是中国兑现做负责任大国和担当国际责任承诺的具体行动，而以柔性又互利的经济手段开展外交，也有助于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全球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争端和进出口贸易争端不时发生，企业“走出去”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开设子公司，削减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缓解国际收支平衡，利用东道国的政策优势，有效规避和化解争端；另一方面切实为东道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如促进就业、增加税收、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积极推动国家之间构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增进人民之间的信任了解，提升企业形象和国家地位。

以国际带国内，平滑经济周期，促进转型升级。在“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或者说将国际因素更多引入到中国经济中来，将有利于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推动力，有利于平滑经济周期影响，提高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特别是企业“走出去”，可以成为释放国内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内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主要传统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化解过剩产能，仅靠关、停、并是不够的，还要把眼光扩大到全世界，积极鼓励企业带着产能“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钢铁产能占世界总产能近50%，2013年世界钢铁过剩产能3.3亿吨，而中国就有2亿吨，占比超过60%。与此同时，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新兴的建筑市场，钢铁市场发展空间巨大。据预测，2014年，仅印尼的钢铁需求缺口就达到400万吨。应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非合作等发展机遇，鼓励国内钢铁企业“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同时为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创造空间。

以企业兴行业，实现产业升级，优化行业布局。“走出去”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也有利于企业开辟新的市场。新加坡国土狭小、市场有限，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企业凭借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利用周边国家潜力巨大的资源和市场，推进在中国等多个国家建立了十多个海外工业园区，成功实现了“立足周边、扩大腹地”的区域化发展战略，实现了本土产业升级和总部经济发展。对行业而言，企业“走出去”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并使得产业链各环节和各要素实现更加合理的配置。通过合理配置，充分发挥整合优势，优化行业内部结构。

金融业服务企业“走出去”，义不容辞、互动共赢

在中国经济上一轮的快速增长中，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同步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彼此推动、互为因果。同样地，在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金融业也不应该缺席，必须义不容辞地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与其相互扶持，最终实现共赢。

勇担责任，全力服务和反哺实体经济。金融业推动了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也从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中极大地受益，获得高速发展。近年来，金融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过去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8.9%，但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年均增长达到19.4%。事实上，金融业无法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存在，也不可能在实体经济发展放缓中独善其身，反哺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实现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企业“走出去”时也不例外。金融业应该正视自己的定位与责任，始终把握“扎根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在携手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担当国家责任。

把握机遇，积极跟随和顺应全局大势。金融业只有“顺势而为”，发展壮大的机遇才能“应运而生”。历史上，花旗银行的海外发展就伴随着战后美国资本输出以及美元国际化战略，这与我国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态势非常相似。德意志银行主动适应了战后德国重建及经济腾飞对大项目、大资金的需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始终顺应全球经济重心变化和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一直走在前列。相比之下，日本三菱银行对于发展海外业务就不够积极，国际化程度远远滞后于其他国家的银行，几轮危机下来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终与东京银行和日联银行合并。当前，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支付货币和第八大交易货币，国际化进程势不可挡，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和金融业都必将从中获益良多。人民币国际化是历史给予中国金融业的重大发展机遇，一定要敏锐地抓住，发挥“走出去”企业、“走出去”金融业和国际化货币的“三位一体”优势。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奠定了人民币流出入的基础，中国金融业亟需实施战略转移、取得战略突破，借助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有利条件，获得与世界加快接轨的历史机遇。

先行随行，与“走出去”企业形成良性互动。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具有很强的“基础设施”属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就像是“路”，企业要“走出去”，必须要先“修路”。为“走出去”企业服务的金融业，要与企业形成良性互动，企业走到哪、金融服务就要跟到哪，企业需要什么、金融服务就要提供什么。目前，中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等形式，与众多经济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企业的足迹也已经随着众多合作项目走遍了全球。“走出去”企业的金融需求与日俱增，并与传统企业存在较大差别，而这正是金融业发挥专业性的时候。单独来看，产能过剩、外汇储备太多、能源需求太大，一个一个都是负面因素。但是，如果把这些与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结合起来，就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一把利剑。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出访非洲，签署多项中非合作重要协议，并提出中国愿优先向非洲转移适宜和所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优势产能，这为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提升金融业服务“走出去”能力，迫在眉睫、多管齐下

随着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金融业亟需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加快海外布局，发展网络金融，实现“全时空”覆盖。由于地理位置和时差的原因，“走出去”企业的金融需求可能随时随地发生，金融业要为之提供服务，就必须做到全空间、全时间覆盖。近年来中国金融业纷纷通过新设和收购等方式，积极扩大海外经营网络。截至2013年末，共有18家中资银行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127家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尽管中资银行近年海外机构拓展步伐加快，但海外机构、资产、利润占比仍然很低，这说明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同时，金融业有庞大的全球代理行网络，在新设和收购因政策或时间原因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与代理行合作的方式，迅速扩大服务网络，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时代，金融业也要通过完善信息系统、发展网络金融等方式，实现物理渠道和电子渠道的互补、互动和协同，实现7×24的无缝隙持续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提升跨境服务，丰富多元化产品，提供“组合拳”方案。“走出去”企业的金融需求，与中国国内企业和东道国国内企业都存在一定差异。金融业应发挥海内外网络布局和多元化业务平台优势，加强跨境和多元化穿透联动，提升业务撮合能力，创新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组合拳”式的金融解决方案。对进出口贸易型企业，可为其提供保函、保理、订单融资、福费廷、大宗商品融资、货运保险、结售汇等服务；对境外投资型企业，可为其提供财务顾问、银团贷款、投融资等服务；对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型企业，可为其提供资信证明、银行保函、贷款承诺、项目融资、工程保险等服务；对区域管理型企业，可为其提供跨境现金管理、投资银行、外汇资金等服务。除定制化的产品方案外，还可以通过专业化的银团贷款、大宗商品融资产品平台，为客户提供更为前沿、高质量的产品。随着国内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商业银行还可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自由贸易账户、准离岸业务等创新业务服务模式，帮助“走出去”企业有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展跨国经营，实现客户群体与服务范围的进一步延伸。

适应监管环境，加强风险管理，完善差异化策略。海外监管环境各异，欧美国家监管体系庞大复杂，而新兴及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色彩浓重，增加了“走出去”金融企业服务的复杂性。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趋严，集中表现在反洗钱压力增大、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流动性风险监管加强等。中国企业在寻找投资项目和投资地区时，倾向于选择经济起步略晚的东欧、中亚、非洲等地，但这些地区政治较为动荡、国家评级较低，企业进行投资往往面临较高的国别风险。甚至在个别国家和地区，政治与宗教冲突仍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应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及国际监管机构的沟通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监管环境。应积极适应国际标准，采取包括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在内的各项措施，推动自身加强资本管理、风险治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积极参与国际商会、SWIFT组织等各类国际组织活动，利用专业地位与优势，在国际惯例、规则的修订过程中行使话语权；完善内部差异化管理策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业务种类，实行不同的业务流程和风险策略，尤其要严格按当地法律行事，尊重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同时，部分“走出去”企业因对当地法律法规、行业惯例、文化传统、舆论环境不熟悉，面临诸多经营困难和风险，金融业也应发挥自身优势，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少走弯路。

加强政策协调，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中资金融业“抱团式”合作。目前来看，“走出去”的各中资金融机构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一是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在部分效益较好的“走出去”项目上存在着竞争关系。由于二者的业务目标、风险偏好不一致，在“走出去”业务产品方面各有所长，政策性银行能以更低的融资价格和更长的融资期限等优惠条件争取客户，商业银行则具有境外网络优势和多元化产品服务能力。两者应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支持企业融资。二是出口信用保险对分担“走出去”企业风险有独特作用，但目前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走出去”企业的需要，相关政策法规也不够健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上讲，“走出去”的中资金融机构，应该有抱团意识，有竞争更要有合作，做到有心胸、有眼光、有风度、有专业性，真正的强大不仅是自己强，还要携手其他中资金融机构同外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与合作，帮助中国企业和中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发出声音。

（作者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山水诗乡、多彩宣城”的发展路径

□姚玉舟

在当下时代，抓文化就是抓未来经济、抓旅游就是抓经济转型。宣城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文房四宝之乡、徽文化发源地之一、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核心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致力打响“山水诗乡、多彩宣城”文化旅游品牌，形成了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得益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提高的良好局面。

立足宣城文化旅游资源实际，我们集聚力量，整合资源，成立了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领导组，设立了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办公室，在去年底市委三届九次全会上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决定》，把文化旅游产业定位为战略型新兴产业和全市主导产业之一，作为实施“11331”发展思路的永恒战略，并且纳入对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单位年度目标考核，设立1500万元专项发展引导资金。明确到2016年，全市接待国内旅游人数超过2000万人次，入境旅游人数超过1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经济总量5%。到2020年，文化旅游产业主要指标、旅游总收入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明显提高。将宣城打造成为泛长三角地区休闲度假地和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大力实施文化旅游产业“八大工程”。去年我们启动实施了文化旅游八大工程，即美好乡村休闲养生旅游开发工程、名胜古迹保护开发工程、敬亭山宛溪河诗山宛水品质提升工程、文房四宝之乡城市品牌提升工程、青龙湾生态旅游示范工程、桃花潭查济古镇名村保护开发工程、历史名人诗画开发工程、扬子鳄旅游开发工程。坚持高标准、高起点，通过工程化、项目化的运作方式，聘请国内外知名规划设计机构逐一制定八大工程发展规划，目前各项规划已经完成，部分项目正在强力推进。同时，制定了八大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共排出了128个文化旅游重点项目，总投资540多亿元，其中今年完成投资约100亿元。

展示“中国文房四宝之乡”的独特魅力。用文房四宝做文化旅游产业文章，是宣城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推进文房四宝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努力把静态的文化资源、分散的文化元素，转化成有广泛参与性和消费面的文化休闲产品，使文房四宝元素融入到“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旅游环节，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着力实施“九个一”项目：一园，文房四宝产业园；一基地，中国宣纸传习基地；一中心，国家宣纸及文房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一剧，文房四宝题材电视连续剧拍摄和播出；一节，办好文房四宝文化旅游节；一带，打造宣城笔墨纸砚产业带；一馆，建成中国文房四宝博物馆；一雕塑群，在市区建成若干处文房四宝题材雕塑群（广场、公园）；一城，争创中国书法城；一电视频道，开办文房四宝电视频道等。目前，位于市区南部、规划面积约1200亩的文房四宝产业园正加快推进，将成为一个以文房四宝主题的展示、交易、研发、观演、体验等特色文化旅游街区，着力把宣城打造成文房四宝文化起源的寻根地和朝圣地。特别是我们从文房四宝制作技艺过程中挖掘、提炼出“千锤百炼、精雕细作、刚柔相济、百折无损”的当代宣城干部精神，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精神动力。

聚焦诗山敬亭山，打造文化旅游产业的精品和龙头。敬亭山位于宣城市区城北，被誉为“江南第一诗山”。据记载，历史上有320多位文人名人写下了近千篇歌咏敬亭山的诗文，李白曾写下“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千古绝唱。为全面提升敬亭山的影响力，对原有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敬亭山风景名胜区的基础上，新设立敬亭山文化旅游度假区，并将规划面积由13平方公里扩展至47.46平方公里。以“天下诗山，国际慢城”为主题定位，以诗文化为核心，融合“佛、酒、茶、画、亭”等文化元素，规划了14个大项目，97个子项目，总投资35亿元。目前，敬亭诗径、中华诗文化博览园、中华名亭、环山公路、石涛纪念馆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计划用3年时间将敬亭山建设成国家5A级景区，成为集生态性、文化性、休闲性、体验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高品质文化旅游度假区。

积极构建市县联动、全域一体的格局。强化旅游资源整合，打破行政区划及行业界限，把宣城12340平方公里作为一个大景区来打造。积极创建“国家级生态市”，把山水林田湖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保持优越的山水生态环境。着力提高城市建设水平，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延续历史文脉，做到山水相依、人文相伴、生态相连，形成“梦栖诗画里、乐享山水间”的风貌，真正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全市“交通建设会战年”活动为契机，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安全快捷的铁路、公路、客运网络体系，打通连接重点景区的快速通道。以全市“文化旅游发展提升年”活动为载体，全面加强景区项目建设，加大食宿、购物、娱乐等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旅游综合接待能力。依托毗邻长三角巨大的客源市场，加强与长三角城市之间的规划对接，促进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统筹协调发展。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游客的消费特征，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旅游文化宣传营销体系。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宣城历史文化、徽文化、文房四宝文化、诗歌文化等研究，让宣城的文化瑰宝走出书本、走出典籍，活起来，动起来。积极推进文化旅游与工业、农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城市建设等方面融合发展，让一产围绕文化旅游调结构，二产围绕文化旅游出产品，三产围绕文化旅游抓服务，各行各业围绕文化旅游出力量，把所有的产业都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节庆文化游、民俗文化游、工业文化游、农业文化游、养老养生游、休闲度假游、健身康体游等文化旅游新业态发展。努力实现由观光游向休闲游、一日游向多日养生度假游、旅游门票经济向旅游产业经济、旅游景区向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大市向旅游经济强市的转变。

无论从宏观战略机遇，还是从社会现实需求来看，宣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正当其时，适得其势，大有可为，我们将进一步打造特色、打磨精品、打响品牌、打动游客，走出一条富有地域符号、具有独特魅力的发展途径，真正使文化旅游产业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宣城市委书记）

下准医治形式主义的药

□宋黔晖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县指导工作时指出，不能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在开封市考察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当前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不要做无用功，不能对付和忽悠，不能表面上浩浩荡荡，最后空空洞洞。”笔者认为，只有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对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认识从知道变成理解，从理解变成接受，从接受变成认同时，形式主义的苗头才能彻底遏制，作风建设才能见常态、见实效、见长效，才能防止活动变形走样。

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的是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切身利益问题，解决的是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只有把改进作风成效落实到基层，真正让群众受益，才能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在活动中，首先应对“群众是谁”认准、摆正。认不清“群众是谁”，找不准“群众在哪里”，必将导致结果谬之千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有的单位把群众界定为困难人群弱势群体，把活动简单等同于访贫问苦送温暖；有的单位尤其是机关职能部门，党员占绝大多数，似乎找不到群众，把活动简单等同于例行的民主生活会，浮于表面；有的单位仅把下属看作群众，把活动简单等同于内部民意测验；有的党员干部认为自己没有担任领导职务，本身就是需要被服务的群众，活动与自己无关。

厘清群众是谁，找准群众在哪里，有助于我们各级各类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明确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找准学习和查摆问题的症结，找准立行立改的方向。群众指什么？首先，是指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职责规定服务的对象，包括直接服务的对象和间接服务的对象，窗口单位直接服务的对象自然是群众，无论其是不是党员。而非窗口单位则大多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等来间接服务群众。所以，教育实践活动不能只盯着每天打交道的老百姓，也要看到我们履行职责时面向的广大社会受众。其次，在一个单位里，下属就是群众，指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再次，党员、团员之外的，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的人，属群众。最后，泛指社会大众。可见，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层面上，他有可能是群众又不是群众。拥有公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即使没有担任领导职务，在单位内部他是领导面对的群众，但就他的岗位而言，他也有要服务的群众。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厘清自己的位置，找准群众在哪里，才能有的放矢。

群众路线是世界观、价值观与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是共产党人的内在道德要求和外在实践能力的统一。践行群众路线不仅仅是方法问题，不仅仅表现为下基层、送温暖等民生工程，更是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作风建设的问题。教育实践活动的真正目标是让广大党员干部明白你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真正触及灵魂，从思想深处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同时把这种世界观转化为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政绩观，特别是要转化为务实的工作作风，才能保证教育实践活动“不歇脚”“不断线”、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没有这种价值观支撑，教育实践活动只能表面轰轰烈烈，实际空洞无效。

拧紧“总开关”，应常怀敬畏之心，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首先应敬畏群众，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核心是站在谁的立场，替谁说话，为谁办事的问题。我们党历届领导人都反复教育全党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不容背离。其次应敬畏权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既清醒认识权力的来源——“权为民所赋”，又清醒认识权力的用途——“权为民所用”，处理好权与责、权与利的关系。再次应敬畏历史，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体现在高楼大厦和项目，也不体现为GDP，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绩，是为党和人民踏实工作的实绩，应该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像焦裕禄同志一样，他在兰考工作的时间仅有470多天，但他带领种下的泡桐在今天已长成参天大树，惠及广大群众，被当地老百姓称作“焦桐”，这种政绩岂能用在任时间、用项目、用工程来衡量？

虽然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时间结点，但践行群众路线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活动中不断加强思想认识，增进价值认同，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思想和行动中，才能防止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防止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变形走样。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校）